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茶经 译注 外三种
(修订本)

[唐]陆羽 等著
宋一明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Cha Jing

or the Book of Tea: Origins and Rituals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Cha Jing

or the Book of Tea: Origins and Rituals

茶经

译注 外三种
(修订本)

[唐]陆羽 等著
宋一明 译注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经译注: 外三种/(唐) 陆羽等著; 宋一明译注.
—修订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11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ISBN 978-7-5325-8377-5

I. ①茶… II. ①陆… ②宋… III. ①茶文化—中国—古代 ②《茶经》—译文 ③《茶经》—注释 IV.

①TS97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2851 号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

茶经译注(外三种)

(修订本)

[唐] 陆羽 等著

宋一明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5 字数 163,000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5325-8377-5

G·650 定价: 3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素称发达，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凯恩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世界科技史后指出，在明代中叶以前，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国在秦汉时期编写的《周髀算经》比西方早五百年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东汉的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和地动仪，比欧洲早一千七百多年；南朝的祖冲之精确地算出圆周率是在 $3.141\ 592\ 6\sim 3.141\ 592\ 7$ 之间，这一成果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擅长发现和发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抱着“普及古代科学技术知识，研究和继承科技方面的民族优秀文化，以鼓舞和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增进群众文化素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宗旨，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当时，特邀老出版家、科学史学者胡道静先生（1913—2003）为主编。在胡老的指导下，展开了选书和组稿等工作。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得到许多优秀学者的支持，纷纷担纲撰写。出版后，也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套丛书在上个世纪仅出版了五种，就不

得不暂停。此后胡老故去，丛书的后继出版工作更是困难重重。为了重新启动这项工程，我社同山东大学合作，并得到了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特请韩寓群先生、徐传武先生任主编，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选定书目，重新修订编撰体例，重新约请作者，继续把这项工程尽善尽美地完成。

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并考虑到现在读者的阅读要求与十馀年前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对该丛书体例作了如下修改：

一、继承和保持原体例的特点，重点放在古代科技的专有术语、名词、概念、命题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要求作者运用现代科学的原理来解释我国古代的科技理论，尽可能达到反映学术界的现有水平，从而展示出我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所存在的不足。为了达到这个新的要求，对于已出版的五种著作，此次重版也全部修订，改正了有关的注释。希望读者谅解的是，整理古代科技典籍在我国学术界还是一个较年轻、较薄弱的一门学科，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中的许多经验性的记载，若要用现代科学原理来彻底解释清楚，目前还有许多困难，只能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而逐步完成。

二、鉴于今天的读者已不满足于看今译，而要阅读原文，因此新版把译文、注释和原文排列在一起，而不像旧版那样把原文仅作为附录。

三、为了方便外国友人了解古老的中国文化，我们将书名全部采用中英文对照。

四、版面重新设计，插图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重新制作，从而以新的面貌，让读者能愉快地阅读。

五、对原来的选目作了适当的调整，并增加了新的著作。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的重新启动，得到了许多老作者的支持，特别是潘吉星先生，不仅提出修订体例、提供选题、推荐作者等建议，还慨然应允承担此套丛书的英文书名的审核。另外，本书在人力和财力上都得到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山东大学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向所有关心、支持这项文化工程的单位和个人朋友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希望热爱《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的老读者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也期望能得到更多的新读者的欢迎。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

前 言

中国制茶、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战国以前，巴蜀地区已经出现茶饮，并于秦汉时期向长江中下游等地区传播。经两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发展，南方地区的饮茶习俗已经较为普遍，但当时的制茶技艺与饮茶方式都比较粗陋。直到唐代，情况才大为改观，茶文化开始发达，并出现了第一部茶书《茶经》。

一、《茶经》的作者及其内容

《茶经》三卷，唐陆羽（733—约 804）撰。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号竟陵子、桑苎翁等，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幼时为竟陵龙盖寺僧智积禅师收养。成年后做过伶工，“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陆文学自传》）。天宝间，河南尹李齐物、礼部郎中崔国辅相继贬谪竟陵，陆羽得到二人的赏识、提携，开始与士人相往来。至德、乾元间（756—759），游历至吴兴（今浙江湖州），与知名诗僧皎然过从甚密，成为“缁素忘年之交”（《陆文学自传》）。上元初，隐居苕溪，闭门读书。《茶经》大概就是此时写成的。

唐代宗广德间（763—764）至德宗贞元间（785—805），陆羽往来扬州、义兴（今江苏宜兴）、湖州、信州（今江西上饶）、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与颜真卿、皇甫冉、刘长卿、戴叔伦、孟郊、权德舆、张志和等文士交游频繁，唱和颇多。后来游幕湖南、岭南，又被朝廷召拜太常寺太祝，再转太子文学，皆未应召。贞元

中（785—805）返湖州，贞元末卒。生平具见《文苑英华》卷七九三《陆文学自传》、《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〇、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等。

陆羽的著述，除《茶经》外，尚有《谑谈》（《唐才子传》作《谈笑》）三篇、《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三卷、《占梦》三卷、《四悲诗》、《天之未明赋》（以上见《陆文学自传》）、《茶歌》（见皮日休《茶中杂咏序》）、《毁茶论》（见《新唐书》本传）、《顾渚山记》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警年》十卷（《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著录）、《穷神记》、《杼山记》、《吴兴志》（以上《宋史·艺文志》著录）、《湖州图经》（见颜真卿《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教坊录》一卷（见崇祯《吴兴备志》）等。均已亡佚。仅《全唐诗》存诗两首，及与颜真卿、耿漳、皎然联句等。今人孙望《全唐诗补逸》辑得联句一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辑得残句二、逸诗一首。《全唐文》存文四篇，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又辑得三篇。

《茶经》凡十篇，各篇分述茶之起源及鉴别法、饼茶制造工具、饼茶制作法、煎茶与饮茶器具、煎茶法、饮茶法、茶事史料、茶叶产区、简略制法、茶图等。《一之源》至《六之饮》六篇，详述陆羽制茶、煎茶、饮茶法，涉及采茶、蒸青、焙制、碾末、煎饮乃至鉴别等内容。其《二之具》、《四之器》记载陆羽创设的采摘、加工、煎饮器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

唐前制茶之法，有原始晒青、蒸青、烘青、炒青等数种，采制及饮用均甚粗略。陆羽探索制作的，则是比较精细的蒸青饼茶。据《茶经》所述，须经采摘至蒸茶、捣茶、拍茶、晾晒、焙茶等复杂工序，所制的蒸青饼茶才易于保存，便于运输，其口感较之前代饼茶、散茶，也有所改善。陆羽又根据饼茶制作的需要，设计或改进了制茶工具，如所制“茶棚”：“高一尺，以焙茶也。茶之半干，

置下棚；全干，升上棚。”这些工具的应用，也有助饼茶焙制质量的提升。

唐以前的主要饮茶方法是煮饮，皮日休《茶中杂咏序》称此法“必浑以烹之，与夫淪蔬而啜者无异也”。陆羽于煮饮基础之上，改进而为煎茶法。其程序大致为炙茶、热捣、研末、煮水、煎茶、酌茶等，均详载于《五之煮》篇中。煎茶用水也需讲求，书中称“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又称“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水取汲多者”，总之以洁净、远离污染为佳。唐张又新《煎茶记》称陆羽曾品评天下水源二十处，并根据其质量高下排定次序。北宋欧阳修虽于《浮槎山水记》、《大明水记》等文中指摘张氏的说法，然而后人多因陆羽重视水源而宁信其真。

陆羽的足迹遍及今南方地区若干省份，又曾游历北方，对唐代的茶叶产区有深入了解，在《八之出》中，概括描述了各个产区的情形。首先划分八大茶产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其中多数当是陆羽亲身所至，才得以如此详细地记述，如淮南，称“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又在注中详载各州产区所在，如称光州“生光山县黄头港”，义阳郡“生义阳县钟山”，舒州“生太湖县潜山”，寿州生盛唐县霍山，“蕲州生黄梅县山谷”，“黄州生麻城县山谷”等。或有少数产区未能到过，因而有“其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州未详”的说法。《茶经》所述产区，并非完全遵照唐时的行政或监察区域，而是依据开元十五道，又参照实际茶叶产区划分的。浙西、浙东均属江南东道，两处单独列出，记述尤其详尽，当与陆羽长居浙中有关。其次，依据一定的鉴别及评价标准，划分各产区内不同产地茶品等级。有些较大的产区，如浙西、剑南，等级划分更加细密。这为后人研究唐代茶叶生产提供了可信的史料。篇中所记地名较多，据之也可考证《茶经》的成书年代。日本学者布目潮沅所撰《茶经著作年代考》（《布目潮沅中国史论集》下册），据《八之出》所述“安康”、“江宁”、“始丰”三县，考其名称改易均在乾元元年（758）三月至上元元年（760）

九月之间，进而推断陆氏撰成《茶经》的时间与之相合。

陆羽发明的煎饮法，所用器具甚为考究，在特殊的条件下，如寒食禁火，处身郊野，仍能以简便的方法煎饮。《九之略》即记述此类步骤简化的方法，并称“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则又表明若无众多器具与繁缛步骤，煎饮法的精妙之处就难以体会。如果对于陆氏煎茶法不甚熟悉，可将《一之源》至《九之略》诸篇钞于绢素之上，以便临时观摩，因而有《十之图》专门言此。或称陆羽确曾绘图描摹器具、煎饮等，如明代万历十六年（1588）秋水斋刻本《茶经》，将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附刻于后，即表明此种看法。然而原书本来无图，《十之图》篇中已经说明，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才称“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

《茶经》既是中国茶学拓荒之作，又是后世茶书的楷模。《茶经》的出现，对唐代的饮茶风气的进一步流行，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详细描述了复杂、精细的制茶、煎茶、饮茶方法，使人倍感雅致；记载的茶事史料，也增添了饮茶的趣味。再通过与陆羽交往的一些文人如戴叔伦、权德舆，以及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鼓吹，陆羽及其《茶经》很受唐人的推崇，从唐赵璘《因话录》卷三所记载的陆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炆器之间，云宜茶足利……又有追感陆僧诗至多”云云，就可见一斑。

二、《茶经·七之事》的史料来源

《茶经》十篇中，以《七之事》所占篇幅最大。此篇大致依照时间顺序，汇集了上古至隋唐茶事史料。对于陆羽撰写此篇时所依据的来源，存在不同意见，一些研究认为是陆羽平时读书的积累，也有学者认为主要抄自著名的类书《修文殿御览》。后者的可能较大，但仅认定一种类书似乎不确，更大的可能是辑录自包括《修文殿御览》在内的几种类书，并少量取材于陆羽参与修纂的《韵海镜源》，甚或还孱入了后人的增补。

提出《茶经·七之事》取材于《修文殿御览》的是日本学者布目潮风，他在《〈中国茶书全集〉解说》中提出这个观点。《修文殿御览》这部北齐时官修的类书，唐代较为风行，并在北宋时作为修纂类书《太平御览》的蓝本之一，南宋时犹存全帙，后来亡佚。敦煌所出古类书残卷P.2526，被罗振玉、曹元忠等定为《修文殿御览》。但这种说法尚未得到完全认可，如洪业即认为P.2526更可能是修纂《修文殿御览》的蓝本《华林遍略》（《所谓〈修文殿御览〉者》）。据《宋会要辑稿》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太平御览》所依据的蓝本，还有《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书，其编纂“特因前诸家类书之旧尔”。近人曹元忠《唐写卷子本〈修文殿御览〉跋》称：“余谓《修文殿御览》今尚存宋李昉等所编《太平御览》中。”又考《太平御览》皇王部、皇亲部编次等，称“《太平御览》之中，非惟具存《修文殿御览》，并具存《文思博要》，亦断可知矣”。认为《修文殿御览》尚保存在《太平御览》中，其说较为可信。

但陆羽编撰《七之事》时是否只依靠《修文殿御览》一种类书，也值得怀疑。因为通过《七之事》与《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茗类比较，可以发现《七之事》所收多有不见于《太平御览》的材料，如引自扬雄《方言》、傅巽《七诲》、弘君举《食檄》、王微《杂诗》、刘孝绰《谢晋安王餉米等启》等各条，而这些极有可能采摭于《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艺文类聚》以外的类书。另外还有所引出处不同的情况，如《七之事》引《搜神记》：“夏侯恺因疾死。宗人字狗奴，察见鬼神，见恺来收马，并病其妻。著平上帻、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太平御览》所引仅“夏侯恺亡后，形见，就家人求茶”一句，且注明出自《晋书》。《太平广记》所引此条甚为详细，其出处为王隐《晋书》，因唐修《晋书》之前有所谓“十八家晋书”，故特为标明。可知《七之事》中此条与《太平御览》出处不一，当是引自其他类书而非《修文殿御览》。

古人著述取资类书的情况并不少见，唐代类书流布之广，也远

非今日所可想象。《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唐开元间所存类书二十二部，凡七千八十四卷。现存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等均在其中，规模较之其他数百上千卷者仅居中等。陆羽如果仅见到数种中等规模类书，稍加纂辑，《七之事》即可大致编成，没有必要再翻检原书，从中一一辑录。

首先，陆羽未必有从原书中手自辑录的条件。因为五代以前，抄写的书籍大多藏于官方，私家藏书远不如两宋以后丰富，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历代藏书家故实，即以五代毋昭裔起首。陆羽并未入朝为官，较难具备利用官方藏书的条件。《七之事》中所收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从集部材料来看，如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史演书》、傅咸《司隶教》、左思《娇女诗》、张载《登成都楼诗》、傅巽《七海》、弘君举《食檄》、孙楚《歌》、王微《杂诗》、南齐世祖《遗诏》、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等，全是唐代最流行的《文选》以外的诗文。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依据前朝藏书目录并核对了官方藏书，所存总集如《文章流别集》、《集苑》、《集林》、《文苑》、《词林》、《赋集》、《诗集》等较之梁时，卷数减少，已有不同程度的散逸。而《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开元时期尚存的官方藏书，上面列举的几种总集除《文章流别集》、《集林》、《诗集》外，都已经亡佚。至《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总集，较之开元时更少。总集如此，别集的情况可以类推。所以能够推测，陆羽在当时难以全部见到《七之事》所征引的各书。而唐代类书主要供文士“储材待用备文章之助”（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其流布范围远大于总集与别集，既易于得到，又便于翻检。

其次，《七之事》所存茶事，除难以确定年代的地理类、医家类各书，以及唐高宗显庆年间由徐勣领衔奏上的《新修本草》之外，大都是唐以前的史料。按照常理，陆羽应能获见较多隋至盛唐的茶事史料，但不予采摭，而仅采与各类书大致相同的内容。实际上是沿袭了唐初类书的做法，可以推知陆羽编撰《七之事》时对于类书的依傍。例如《七之事》所采医药书，除唐修《本草》外，

年代多不可考，而唐代流行颇广的孙思邈《千金翼方》却未征引。如《千金翼方》卷二十二“治石痢方”：“淡煮真好茶汁，服二三升，重者三服，轻者一二服即差。”时代更早而未采摭的书还有晋常璩《华阳国志》。书中记有西南各地茶产情形，如卷一《巴志》：“其地东至鱼复，西至犍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苴、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同卷又称：“涪陵郡……无蚕桑，少文学，惟出茶、丹、漆、蜜、蜡。”卷三《蜀志》：“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与《七之事》所引山谦之《吴兴记》“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笋”，以及《夷陵图经》“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等极为相类，但均未采入。唐代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均对《华阳国志》有所征引，但未引涉及茶事的条目。《七之事》中引用各地“图经”，而不引此书，如果是陆羽手自辑录的话，应当将此书中与茶有关的内容采入《七之事》。除此之外，王维、岑参、李白、杜甫等人集中均有涉及茶的诗句，《七之事》全未征引，而唐初所编的类书对上述各家的诗文当然是无从采摭的。

再次，《七之事》所引各书，除司马相如《凡将篇》等少数外，其余各条多能在今存唐宋类书中找到相似记载，且截取、节引的原文也大致相同。而引用时不免删节和改动，也正是类书的一个特点。如左思《娇女诗》，全诗甚长，《七之事》节引为“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姊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鑪”。《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茗类所引虽用字多有差异，但节引的诗句与之完全相同。对比《玉台新咏》卷二所收全诗，“口齿自清历”与“有姊字惠芳”之间有十二句，“眉目灿如画”与“驰骛翔园林”之间有十四句，“果下皆生摘”与“贪华风雨中”之间有两句，“倏忽数百适”与“心为茶荈剧”之间有八句，“吹嘘对鼎鑪”后还有八句，可以看出节略不顾

全诗内容，较为轻率。而《茶经·七之事》与《太平御览》所节选的诗句竟然完全相同，不可能只是巧合，使人不得不怀疑两者均非辑自原书。前面已经讨论过《太平御览》的编纂是有其他类书作为所依据的蓝本，那么由此看来，《七之事》所引《娇女诗》与《御览》应为同一出处。另外，两书所引文字差别甚大，应当排除《御览》取材于《茶经》的可能。

另举《七之事》所引《世说》的例证。《世说》即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七之事》的引文为：“《世说》：任瞻，字育长，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下饮，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分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茗类亦引此条，而文字稍有不同：“任瞻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不饮茗，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之曰：‘向问饮为热为冷。’”对比之下，除《御览》所引“既不饮茗”当有误字外，其他大致相同。然而再对比《世说新语·纰漏》，则会发现存在较大问题。首先，“任瞻，字育长”是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的内容，《七之事》所引将其移至正文之首。其次，“有令名”至“自过江”之间有“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一段文字。因与茶无关，引用时删去也未尝不可，但关键在于，“失志”至“既下饮”之间又有“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一段文字，由此才能理解任瞻所谓“为茶为茗”，实际上是失意之下心不在焉的口误。《纰漏》门所收均为因行为、言语疏漏导致尴尬的轶事，《七之事》及《御览》所引均缺少具体语境，使人难以理解，甚至误以为冷、热是区分茶、茗的要素。之后又有“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等文字，《七之事》、《御览》也都删去未引。由所引不顾及语境的做法来看，《七之事》与《御览》应该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有共同的蓝本。

《七之事》取资类书的痕迹，还表现在仅见于二者的异文上。

如《七之事》引《晏子春秋》，作“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五卵”、“茗菜”均与《御览》卷八六七所引相同。《晏子春秋》各本中有“卵”作“卯”者，但“茗菜”均作“苔菜”。《御览》卷八四九“食”下引《晏子》此条，作“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菜耳”。《七之事》与《御览》卷八六七同将“苔菜”讹作“茗菜”，可知《七之事》与《御览》修纂蓝本之间的沿袭关系。

最后，《七之事》的编次，除篇首以朝代为次列举人名外，茶事的胪列与类书相似，从中不难发现辗转承袭的痕迹。列举的人名仅表明书证的时代，篇中还有一些材料并未在篇首列举。比如各地“图经”及《后魏录》、《桐君录》等作者不明的书。一般类书的编次方式，多是先胪隶事，再列诗文，《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均如此。相比之下，《七之事》的编排方式更像《太平御览》。《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茗类，实际上比《七之事》更难看出编次的依据。《御览》先引《尔雅》，再列举大致以时代先后为序的隶事各条。其中地理类各书如《坤元录》、《括地图》、《广州记》、《南越志》及各地“图经”等，均排列在一起。最后是诗文。还可以肯定的是，《御览》茗类的排列并非受《七之事》的影响，因为《御览》中其他部类的排列也基本如此。如卷九六六《果》部橘类，隶事之后列举了地理书《水经》、《南夷志》、《湘州记》、《云南志》，及其他书中记载的各地的出产情形，最后是自《楚辞》以下的历代相关诗文。又如卷九六七《果》部桃类，也是先列隶事各条，再举地理书记载的各地出产。其后又有隶事数条，继以《本草》及诗赋等，可能反映出《御览》修纂时混编几种类书的痕迹。但无论如何，与《七之事》所引各条的编次方式是极为类似的。

此外，古人著书观念也与今日稍有不同，采摭相关史料纳入所著书中，如《汉书·艺文志》删省《七略》，唐宋笔记相互因袭，以当时的观念尚能接受。因而《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小叙称：“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又称：“注书者得之，左右采获，

裨益博闻，不俟旁求，典则悉在。高明之士，固有别择去取之材；下愚者则不免蹈剽窃稗贩之失，斯又编书之人所不能任咎者也。”

三、《茶经·七之事》与《韵海镜源》的关系

《七之事》所引史料不见于今存类书征引的，有些可能出自陆羽参与编纂的大型韵书《韵海镜源》，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傅树勤《茶经的成书年代》）。今略述《韵海镜源》的成书、编纂情形及性质，以考察《七之事》从中取材的可能性。

大历间（766—779），陆羽寓居湖州，参与颜真卿主持的编纂工作。《新唐书·文苑传·萧存》：“颜真卿在湖州，与存及陆鸿渐等讨摭古今韵字所原，作书数百篇。”颜氏早年即有编纂之意，《颜鲁公文集》卷四《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云：

真卿自典校时，即著五代祖隋外史府君与法言所定《切韵》，引《说文》、《苍雅》诸字书，穷其训解，次以经、史、子、集中两字已上成句者，广而编之，故曰“韵海”，以其镜照源本，无所不见，故曰“镜源”。

编纂历经三次，据《妙喜寺碑铭》，“天宝末，真卿出守平原，已与郡人渤海封绍、高萁，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浑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属安禄山作乱，止其四分之一”。检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颜氏任德州（平原郡）刺史，在天宝十二载（753）至至德元载（756），由于安史之乱的原因，编纂工作陷入停顿。大历三年（768）至七年（772），颜氏任抚州刺史，与“州人左辅元、姜如璧等增而广之，成五百卷。事物婴扰，未遑刊削”（《妙喜寺碑铭》）。其时此书规模已具，但以卷帙过繁，为求精审起见，务必进行删省。因而“大历壬子岁（772年），真卿叨刺于湖。公务之隙，乃与金陵沙门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萼、陆羽……以季夏于州学及放生池日相讨论，至冬徙于兹山东偏，来年春遂终其事”（《妙喜寺碑铭》）。参与末次编纂者约二十人，以颜氏抚州任上所编为基础，从五百卷删省至三百六十卷，其中或许有查缺补遗处，但删省之事居多，所以仅用半年即可完成。全书编成后，于大历十

二年献呈朝廷。《旧唐书·代宗纪》：“十一月……刑部尚书颜真卿献所著《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

《韵海镜源》卷帙浩繁，传写不易，流传不广，到北宋时已残缺大部，南宋时全部亡佚。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颜鲁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为《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万汇，其广如海，自末寻源，照之如镜。《崇文总目》仅存十六卷，今不传。”《崇文总目》成书于庆历初，其时《韵海镜源》只存十六卷，实际上大部分已经亡佚了，南宋末王应麟连这十六卷残本也没能见到。清道光间，黄奭《汉学堂经解》辑得一卷，大多数仅有条目、别体及反切，牖列的书证仅有鲍明远《书势》一条，所辑均未注出处，较难从中看出《韵海镜源》体例。

《韵海镜源》是兼具类书性质的大型韵书，取材广泛，征引闳博。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二《声韵》条记其体例：

更于正经之外，加入子、史、释、道诸书，撰成三百六十卷。其书于陆法言《切韵》外，增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说文》为篆字，次作今文隶字，仍具别体为证，然后注以诸家字书。解释既毕，征九经两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编入本韵，爰及诸书，皆仿此。自有声韵以来，其撰述该备，未有如颜公此书也。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六《骈字类编》条称此类以韵为纲隶事之书，“所采诸书，皆齐句尾之一字，而不齐句首之一字”。清人所编《佩文韵府》，即与之类似。这种依韵编录的类书源出于唐前，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群玉典韵》条称始于《群玉典韵》及张谅《韵林》、潘徽《韵纂》等。依前人所述体例，《韵海镜源》隶事书证必然宏富广博。加之陆羽所见的最初五百卷的规模，虽小于一千二百卷的《文思博要》、一千卷的《太平御览》，但较之三百六十卷的《修文殿御览》、一百七十三卷的《北堂书钞》、一百卷的《艺文类聚》，规模相当可观，应该包含不少茶事书证。陆氏很有可能在参纂时加以采辑，补入尚未完备的《七之事》中。从今日可见的《佩文韵府》看来，此种韵书所引材料多与类书相似，只